

# 从《论语言的二元本质》看索绪尔的语言哲学<sup>(\*)</sup>

聂志平<sup>1 2</sup>

(1.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2. 浙江师范大学 语言研究所,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索绪尔书稿《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中所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 语言可以归结为几组二元对立, 语言质体是由形式差异和由此形成的意义差异所构成的负性统一体; (二) 语言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区分, 是由语言事实决定的; (三) 语言符号不具有正面的肯定的性质, 它的价值是什么, 不是由自身的性质, 而是由体现为形式与形式之间、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相互差异的负性原则所确立的, 是由符号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关系所形成的系统性决定的。与通行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相比, 索绪尔《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中对语言符号性质的阐述更加深刻而系统, 是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

(关键词) 语言理论; 符号学; 语言符号; 二元性 《论语言的二元本质》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23.03.016

从语言学史的角度来看, 现代语言学是与索绪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沙·巴利等根据学生听课笔记整理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后, 其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 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语言学的发展历程, 也为其他人文学科所吸收、借鉴。20世纪50年代以后, 在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文学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等的推动下, 以法国为中心, 形成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主义、符号学遂成为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以往的索绪尔研究材料, 在20世纪主要有四部分: (1) 出版的著述, 即索绪尔生前发表的数量不多的几篇论文, 包括索绪尔的博

士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1880年)和著名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1878年); (2) 讲座记录(如关于音节的讲座)和一些札记; (3) 沙·巴利和阿·薛施霭根据学生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1916年/中文版1980年); (4) 当年听课的学生孔斯坦丹1958年赠给大学图书馆, 1993年被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课程的笔记(中文版2001/2002年)。1996年, 由于索绪尔故居维修, 在夹墙中发现了索绪尔在与学生谈话时提到的写过但找不到的关于普通语言学的书稿以及一些札记。1996年发现的新材料, 加上以前所收集的

作者简介: 聂志平, 语言学博士,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言学理论、符号学和现代汉语。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研究”(16NDJC040Z)的阶段性成果。

一些材料,经西蒙·布凯和鲁道夫·恩格勒编辑,2002年出版了法文版《普通语言学手稿》(中文版2011/2020年),成为出自索绪尔本人笔下较全面反映其普通语言学思想的文本,在语言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

《普通语言学手稿》包括四个部分:“论语言的二元本质”“词条与格言”“普通语言学的其他文稿”“普通语言学备课笔记”,其中第一部分“论语言的二元本质”是未完成的书稿,章名是索绪尔自己拟定的;其余三部分,有1996年新发现的材料,也有恩格勒《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校勘》(法文版,1968—1974)使用过的材料。

在《普通语言学手稿》中,第一部分内容是索绪尔自己拟好题目的一部未完成书稿,一共76页,这就是1996年修葺索绪尔故居时在夹墙中发现的所谓“橘园手稿”,也就是索绪尔曾对自己学生提起的曾经写过的书稿,一部“探讨语词(mot),作为语词科学(science des mots)的主要扰乱者的语词”<sup>(1)</sup>的书。在第四部分“普通语言学备课笔记”中的“第二次教程注释(1908—1909):二元性”中,索绪尔说“语言可以还原为五六个二元性,或成对的东西。”不过接下来提到了二元对立是三种:(1)语言的心的两个方面,能指/所指;(2)个体/大众;(3)语言/言语。<sup>(2)</sup>笔者联系1891年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的三次关于普通语言学讲座的内容,还可以概括出:(4)诸语言/抽象语言;(5)时间上的连续性/变易性;(6)地理上的连续性/分散性,以及其他文稿中所提及的第七个对立:事件/状态;亦或历时/共时。有人说索绪尔是二元对立大师,一点也不为过。不过,在“第二次教程注释(1908—1909):二元性”中,索绪尔只列出了三种二元对立,并不是索绪尔的一时疏忽:这三种二元对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语言本体处于核心地位的二元对立。而最为根本的,是语言符号本身的二元对立,即“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以及此符号与彼符号的对立,后者确定了语言符号本身,并由此导致语言符号系统性。这是语言最本质、

最核心的部分。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任务是:

(a) 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出它们的历史,那就是,整理出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

(b) 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

(c) 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sup>(3)</sup>

而“能指/所指”“个体/大众”“语言/言语”这三个二元对立,尤其是最核心的“能指/所指”二元对立与语言符号单位本身说清楚了,语言学的第三项任务,即确定语言的“界限和定义”,也就是弄清“语言是什么”这个语言学的核心任务,也就大部分完成了。索绪尔的《论语言的二元本质》,就是主要探讨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二元对立和语言符号单位自身确定(价值)的一部独立书稿,从相对于其他文稿的分量,就可以看出索绪尔对这两个问题所下的功夫之深,用情之专。——弄清语言学的对象是什么,亦即语言是什么,这是语言学最基本的前提。这是索绪尔对前学批评的主要着眼点,更是索绪尔语言理论大厦的基础与核心,同时也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本文根据《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书稿来分析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我们以于秀英2020年的商务版译本为主要依据,有时为了更好地理解,也会对比于秀英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版译本,如作为语言基本单位词语,2020年商务版都译作“字”,而在2011年南京大学版中译作“语词”“词语”或“词”,由于语言学界通常认为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而不是字,因此本文采用南京大学版的译法并作脚注说明。

#### 一、语言质体:由形式差异和由此形成的意义差异构成的负性统一体

学科的对象是该学科最重要的核心概念。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不同,语言学的对象不是现成

地摆在研究者的眼前,需要从异质的纷繁复杂的言语交际活动中把它区分出来:明确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学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前提。《论语言的二元本质》就是从二元对立角度来分析,价值、对立、差异、负性、同一性、空、无实质性、关系、系统等概念,无一不是指向语言符号或语言单位这个语言学的核心对象;这部未完成的书稿,可以看作是索绪尔对语言符号学的系统研究,这种对本体、存在和关系的探索,毫无疑问,是索绪尔语言学的哲学,具有语言观和方法论性质。不过,因为写作时间的原因,在这部书稿中,还没有使用“能指”“所指”这对对立的术语,——“能指”和“所指”这对术语,还是索绪尔在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教程中,在所有课程过大半的1911年5月19日(7月14日结束),在第五章课程中对前两章进行补充时,才提出来的;<sup>(4)</sup>而书稿中的“符号”也不是指作为整体的符号,而是指符号的形式,亦即后来的“能指”;这个意思有时也用“形式”来指称。

索绪尔认为,“没有语言质体可以是给定的,可即刻通过感官而给定”,<sup>(5)</sup>“永远无法在语言中发现个体,即就自身所确定的存在”,<sup>(6)</sup>因为语言学的对象是复杂的,而且这种复杂性中并不具备自然单位;有什么样的观点,就可以确定什么样的个体单位。“在语言中,有必要区分两种现象:一个属于内在的意识现象,一个是可以直接把握的外在现象”;<sup>(7)</sup>因为单一的现象无从构成语言单位,所以对语言单位的确定,就意味着两种异质要素的结合。

语言现象的二元论存在于下述二元性中:即作为声音的声音和作为符号的声音,前者是物理现象(客观的),后者是物理—精神现象(主观的),但绝对不是语音之‘物理’与意义之‘精神’的对立。有一个领域,内在的精神领域,符号及意义存在其中,相互依存,无法分离;还有一领域,外部的领域,那里只有‘符号’,但却化为一个连续的音波,我们只能将其命名为声音形象。<sup>(8)</sup>

索绪尔区分了物理的声音和作为符号的声音,认为意义与作为意义载体的符号,都存在于内在的精神领域,但它们是异质的;而体现在外部领域的,是符号(作为意义的对立面和载体)的外化——声音形象,“声音形象得自于概念,得自于符号功能”,<sup>(9)</sup>“声音形象被引入到所谓的语言的符号游戏中来,从此,它就变成形式”,<sup>(10)</sup>“语言学上只存在着意识所知觉到的,即如其所是或变成符号”。<sup>(11)</sup>作为声音形象的构成部分,“语音在场是人们想象而不可还原的要素”,它只有与其他语音相互对立时才有价值,亦即这种语音在场的一种“相关性的呈现”,<sup>(12)</sup>是相对的或相互的价值,纯粹的语音不属于语言,“声音方面的质体不是语言的质体”;<sup>(13)</sup>所以,“在言语活动中,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根本没有以其自身界定和确定的个体”,“所获得的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再只是一个单位”,<sup>(14)</sup>因为单位(个体)是由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形式的价值、意义、功能或用法,是同义的。“一个语言系统(形态系统),一个信号系统,首先是由不同的价值构成的”,要使一个形式作为形式,必须有两个恒定的条件:“1°这一形式不能脱离同时出现的其他对立形式。2°这一形式不与其意义相分离。”<sup>(15)</sup>因为形式与其意义相对,才是其意义的形式,否则不成其为形式;同时,形式也是与其他形式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产物,单独存在之物是不能构成形式的。因此,“不能借助形式所代表的声音形象来定义形式是什么;——更不能借助声音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对之下定义”,——因为形式与意义是不同质的东西,“必须用普遍复杂的事实来作为首要事实,这一事实是由两个相反的事实组成的:即声音形象的普遍差异,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意义的普遍差异”;<sup>(16)</sup>形式不是“某种肯定的简单的质体,而是复杂且相反的质体:得之于与其他形式的不同”,<sup>(17)</sup>形式体现为彼此之间的差异,亦即不同,“形式这种存在,除了用法之外,全然虚空”。<sup>(18)</sup>因此,“语言建立在一定量的可识别的差

异或者对立之上,而相对词项的每一绝对价值则无关紧要,它可以变化很大,语言状态却不会因此被打破”,<sup>(19)</sup>因为语言单位的同一性,是依据彼此之间的差异,亦即相互对立来确定的:同一性,不过是差异性的另一面而已。

索绪尔认为,“1°符号只根据其意义而存在;2°意义只根据符号而存在;3°符号和意义只根据符号之间的差异而存在”,<sup>(20)</sup>语言符号的两面是互相确定的,具有双面性,缺少其一就不能构成符号,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曾把声音(音响形象/声音形象/听觉形象——笔者注)与

思想(概念/观念——笔者注)比作一张纸的正反面,不可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来说明符号(符号的形式即能指——笔者注)与意义的一体性;<sup>(21)</sup>符号是差异或者对立亦或关系的产物:(1)形式与意义的关系;(2)形式与形式的关系(表现为差异或对立);(3)意义与另一意义的关系(表现为由形式而形成的差异或对立),——“意义只是表达形式价值的一种方式,这一形式的价值,在每时每刻,都完全取决于与其共存的形式”。<sup>(22)</sup>所以,“形式与意义是一回事,而且形式是四项的”四个对立项关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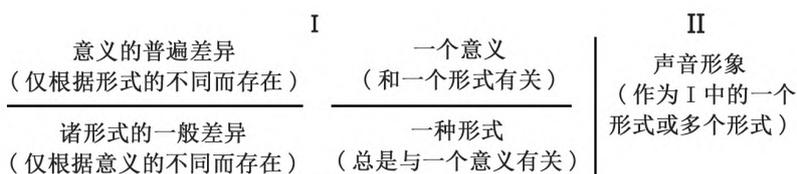


图1 四个对立项关系示意图<sup>(23)</sup>

对这四个对立项,索绪尔解释道“任何形式都不仅与一个概念相对应,任何意义也不仅与一个符号相对应。……事实上,只有一些形式的差异和一些意义上的差异;另一方面,这些不同范畴的每一个(因此自身已是相反的东西)正是靠与别的结合才作为差异而存在。”<sup>(24)</sup>

这个对立项关系示意图说明,一个意义必然是一个形式的意义,一个形式必然是代表一个意义的形式;根据形式不同的意义间不仅具有普遍的对立与差异,也与根据意义不同而存在的形式的对立与差异相互依存,而这些相互关联相互对立,通过声音形象这种负载意义的形式间的差异而体现。因此,无论是形式还是意义,都不是靠自身,而是靠形式与其他形式之间,意义与其他意义之间,彼此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差别来彼此规定的,从而所构成的整体——语言符号——也是在与其它语言符号彼此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区别中来确定自身的,它不是由它本身是什么,而是由它不是什么——亦即“负性”——来决定自身价值的,所以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作“负性统一体”或“无实质性”。索绪尔的这个图示

以及解释,深刻地阐明了符号形式与意义的一体性、差异或对立的复杂性,这是对语言符号系统性的最好说明。因此,“处于符号的世界还是意义的世界,其实是一回事”,<sup>(25)</sup>“说符号,就等于说意义;说意义就等于说符号”。<sup>(26)</sup>

## 二、共时/历时 “是语言事实决定要把历时和共时分开”

索绪尔认为,“一个给定时代所具有的种种言语行为,其实代表一种表达这些事实的经验方式,而与此同时,表达这些事实的理性方式则专一是借助往昔的。……每一言语行为既存在于当下,也存在于过去”。<sup>(27)</sup>这样,语言就存在于现实的状态和过去的历史,或者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但“存在着科学的,而且与每种语言状态自身都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不需要历史观点的介入,而且根本不取决于历史的观点。一开始就要系统地排除任何成见和任何历史观念,如排除历史术语一样”,因为语言“系统完全独立于历史而运作”。<sup>(28)</sup>首先,语法是系统的,“语法是对确定的语言状态进行的分析”,<sup>(29)</sup>语法是语言共时

状态的产物,某一个形式的语音形象与以前的差异如某个音的脱落,是一种历史事件,但只是在共时的语言状态中,由于它与其他形式的差异或对立,才赋予了这一形式的某种价值。其次,音位也是系统的,作为声音形象的构成部分,说 a 是某个音,完全是由于同时还有其他的音 b、c 等的存在, a 正是由于与 b 和 c 等的对立、差异而体现自身价值的,这样的 a 就不是物理性的某个音自身而是与 b、c 等相对关系的产物,所以才存在“语音波动(fluctuation)现象”,<sup>(30)</sup>这是一种发音上的自由度,允许发 a 时存在一定的变异,发成 a'、a''、a'''等,只要不发成 b、c 等就可以,顶多会给人一种不大自然的感觉,这样的 a 就不再属于物理的音响性质,“在一给定时刻所考虑的系统,显然没有什么可以是语音的”,<sup>(31)</sup>“只要确定于给定的语言状态,它在任何方面与形态学的原则都无区别,实际上是纯粹形态学的”,<sup>(32)</sup>物理性的实体性(或实质性)的语音,是在语言系统之外的。

索绪尔认为,“某种语言符号之所以能够存在,因为有其他符号存在,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事实”,<sup>(33)</sup>“符号和概念……须完全遵守瞬时,只是瞬时而已。这属于形态学、句法学、同义词等”,<sup>(34)</sup>索绪尔把语言系统与海军信号旗系统相比较,认为海军的信号旗有两种性质的存在:第一种是作为红色或蓝色的布料,第二种是把它当作一个符号,是表示某种意义的一种存在;在后者中,第一含有依附于其上的某种意思,第二它作为代表某种意思的符号,不是由于自身的颜色,而是:(1)它与同一时刻出现的其他符号的差异;(2)它与本可以出现在其位置上、与其同时存在的但此时此刻并未出现的其他符号的差异;——除了“这两个相反要素之外,如果问符号的肯定的存在是在哪儿,我们立刻看到它不具有任何肯定的”<sup>(35)</sup>东西。因此,“任何语言符号脱离了与其他符号相对立的关系,都不曾有过哪怕是瞬时的自足的存在”,<sup>(36)</sup>“的确唯有周边的符号才能确定每一符号的价值和存在……可见,必

须忘记词源学的内容或回溯的情况,这些意识中没有的东西”,<sup>(37)</sup>“正如象棋博弈,在游戏之外问王后、卒子、象、骑士是什么,那会是个很蠢的问题”。<sup>(38)</sup>

正因为如此,所以,索绪尔得出了如下结论:“要对永远瞬时的‘语言’存在与注定是时间中传承的‘语言’存在加以绝对的分隔,我们认为没有比这一点更为必要的了。事实上,语言中的一切往往因其传承的偶发事件所致,但并不意味着可用传承的研究来取代语言的研究;……每一时刻都有两个全然有别的范畴:一个是语言,另一个则是这一语言的传承”,<sup>(39)</sup>因此,“是语言事实决定要把历时和共时分开”,<sup>(40)</sup>“在每个时代,只有相对立,相对的价值”;<sup>(41)</sup>而“只要说出言语或言语活动一词,不能不首先注意到语言跟语言的传承之间可能会发生的混淆”,<sup>(42)</sup>但是“永远把连续的或回溯性的,与瞬时或当下,直接或普遍的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是一种灾难”。<sup>(43)</sup>

在语言学史上,从学术渊源角度来看,最早提出语言具有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的是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索绪尔无疑是接受了这一观念,但索绪尔却主张摒弃历时而专门致力于共时研究,其理论前提是对语言符号的认识,(‘历史句法’)这门‘科学’并无真正的科学基础”,“语言状态给语言学家的研究只提供唯一的一个中心对象:形式与寓于形式中的概念之间的关系”;<sup>(44)</sup>认为语言符号的确定取决于形式的差别、意义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的对立统一。语言符号彼此之间的差别、对立,必然导致语言符号的系统性,差异、对立只能源于形式、意义和语言符号存在的共时性或状态性,因此对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必须排除历时因素和历时观念的干扰。这是索绪尔的高明之处:他对博杜恩的静态、动态对立的认识,不仅有术语的改造——用有共同词根而有彼此对立的“共时”“历时”来代替博杜恩的术语,这不仅仅是吸收和整合,<sup>(45)</sup>更有基于对语言符号本身认识而形成的对语言共时态的理解,这种理解就是,只有共时

的,才是语言系统本身的;只有共时语言学,才是对语言符号系统本体的研究。此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还从说话者意识之中只存在语言状态,以及语言自身两个角度,来说明语言共时态实际上就是语言符号系统本身。<sup>(46)</sup>在语言学史上,雅柯布森、<sup>(47)</sup>高名凯、<sup>(48)</sup>徐思益<sup>(49)</sup>等语言学家认为索绪尔割裂了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割裂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是没有道理的。

### 三、语言单位的确定:负性原则、差异、空、价值、系统

索绪尔认为,“语言要素并非什么别的东西,不过是一个根据某种约定与系统其他要素相对且具有价值的构件而已”;<sup>(50)</sup>“从根本上讲,语言建立在差异之上”,“语言本质上仅依据相对立关系,仅依据一套全然相反的价值而存在,只因其相互对照而存在”,“负的原理其实就是语言的机制”。<sup>(51)</sup>语言学所面对的对象,除了与其他对象的差异以外,没有自身的现实性,没有任何存在的物质实体性(或实质性)基础,存在的只是词项之间的差异,而且差异只是以相反的方式存在(即不是什么);“至于这些‘差异’——语言由其构成——它们什么也不代表,倘若没有赋予其意义的话,在当下甚至没有意义:要么它们是各种形式的差异(这一差异什么也不是),要么是精神所感知的各种形式的差异(这已经有点意义,但在语言中还不算什么),要么是由复杂的关系游戏和最终的平衡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差异。所以,‘正’的词项亦不存在,唯有差异。进而言之,差异是形式与感知意义结合的结果”,<sup>(52)</sup>所谓的“负性”,是指语言符号不是由其本身的性质从正面亦即由它是什么来确定的,而是由语言符号彼此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差异、不同,体现为彼此的对立——,是从反面,亦即它不是什么来确定的,物质性或实体性(实质性)的事实与语言毫不相关,这种非物质性或非实体性,也就是“空”:在语言中“词项差异是由词项之间的关系所确定的,无此种差异,词项就是虚空的、不确定

的”;<sup>(53)</sup>所以符号“从来都只是以负的方式,通过同时呈现的其他符号而被界定”,<sup>(54)</sup>因此“无论是以何种观点来考察语言的本质,语言都不建立在绝对或正的价值体系上,而在于相关或相反的价值,仅靠其相对作用而存在”,<sup>(55)</sup>这样确定下来的语言符号只能具有相对性而不具有实体性(实质性:“由于没有任何单位是建立于它物之上,而只是建立于差异之上,单位其实总是想象的,唯有差异存在”。<sup>(56)</sup>相对于物质性或实体性(实质性)这种依据语言符号彼此之间的相互对立所形成的差异,是一种彼此依赖的相互关系,具有非物质性或非实体性,就是相对于“实”的“虚”相对“物”的“空”,相对于“正”的“负”。正是因为如此,“呈现、缺席或者连续形式具有同等意义,这就是说每一符号都时时地绝对地具有某种价值,无法预见,且取决于周边的符号”,“零符号在产生之时与带正号的符号完全是一回事”。<sup>(57)</sup>索绪尔甚至用箴言式的话语作这样的概括“存在,什么都不存在”,“这个是那个”。<sup>(58)</sup>

索绪尔关于差异、负性原则、空、价值、零符号这些概念或原理的论述,其抽象程度和论证方式,是纯哲学性,理解起来有些费力气。相比之下,作为课堂讲述,则显得生动好懂些。比如,说到价值,索绪尔用5法郎价值的判定作比喻来说明:“(1)能交换一定数量的不同的东西,例如面包;(2)能与同一币制(美元等等)相比”,进而引导语言符号的价值“同样,一个词可以跟某种不同东西即观念交换;也可以跟某种同性质的东西即另外一个词相比”。<sup>(59)</sup>价值不是实体性的,而是相互关系的产物,是系统的产物。我们认为,索绪尔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也可以换两个例子来说明。一百元人民币的价值,肯定不取决于印刷一百元人民币所用的特殊纸张和油墨,而取决于一百元人民币在人民币面值序列中的地位,取决于它的购买力,取决于它相对于英镑或美元等的相互比值;中国象棋中的“象”虽然用这个字形,但它的意思明显不同于作为汉语中表示“长着长鼻子、多有一对长而大的门牙伸出口外的大

型食草哺乳动物”的词语的书写符号,在象棋中的“象”,它的意义或价值,只取决它在象棋中与“车”“马”等棋子的不同,取决于它的位置和走法。索绪尔真是极其高明的教师,举例贴切,深入浅出。《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举的例子都很高明,即便是有不同意见,语言学家们都对索绪尔的比喻赞叹不已。“深入”,就是像《论语言的二元本质》这样索绪尔写作的著作和文章,“浅出”就是索绪尔在教学活动中对整合在自己语言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形象化阐释,这两者的结合,就是即便仅仅作为课程笔记整理出来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也有着远远超出一般语言学著作的深刻。

#### 四、结 语

索绪尔把语言看作符号系统,并深刻地阐述了语言符号的性质,它构成了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基础与核心,也是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索绪尔语言理论广为人知并深刻地影响现代语言学,以前主要是根据学生听课笔记编辑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但索绪尔对语言的深入思考,却远在20世纪初期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课程之前。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形成,应该以本文分析的这部大约写作于1894年<sup>(60)</sup>的未完成书稿《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为标志。这部书稿是索绪尔集中思考语言理论问题的结果,它是20年后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中片段式的精彩理论阐述的来源。如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某些表述还会让人感到有些突兀费解,那么《论语言的二元本质》对问题的阐述则更加系统全面,索绪尔用一系列对立统一的“二元性”,深刻地剖析了语言符号的本质,所形成的关于语言符号的系统性认识——语言符号学,处处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sup>(61)</sup>正是由于有这种哲学的眼光,即便是吸收、整合前辈或时贤的理论观点,但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体系中却条理贯通、浑然一

体,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正是索绪尔的伟大之处。

#### 注释:

(1) [19]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于秀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23页。于秀英译2020年商务版《普通语言学手稿》第16页将mot译作“字”。

(2)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于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83-284、24、27、17、25、25、43、51、29、37、31、30-31、34、41、36、23、42、47、48、48、33、50、51、52-53、51、79、68、66、56、60、61、73、75、74、63、74、95、56、93-94、74、73、78、71、86、88、91、75-76、89页。

(3) [21] [59]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158、161页。

(4)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张绍杰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1-102页。

(5) 李葆嘉先生认为索绪尔对共时、历时的认识,也只是接受博杜恩的说法并整合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见李葆嘉、邱雪玫《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群体模式考察》,《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李葆嘉、叶蓓蕾《索绪尔〈教程〉与博杜恩理论的比对》,《南开语言学刊》2018年第2期。

(6) 聂志平《论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3期。

(7) [美]罗曼·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钱军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50-51页。

(8) 高名凯《德·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59-660页。

(9) 徐思益《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史性》,《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10) 《普通语言学手稿》未标《论语言的二元本质》的写作时间。这一点是中山大学屠友祥先生电子邮件告知的,谨致谢意。

(11) 这一点也佐证了笔者早期一篇论文中的一个说法“索绪尔对语言系统的理解带有很深的去掉了那层‘神秘外壳’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胎记。”聂志平《语言:语法系统 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索绪尔语法思想初探》,《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责任编辑:汪家耀)